学术思想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罗检秋

[摘要]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关键词] 汉宋融合 刘台拱 刘宝楠 《论语正义》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6) -03-0066-11

Between Han and Song Schools: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u Family in Baoy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general, the Han and the Song Schools were the rivals.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Han Learning was continually influenced by the Song Learning. The Liu Family's scholars were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Song Learning's influence on scholars of Han Learning. They inherited and then imparted the Song Learning heritage of the early Qing, and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focus to textual research. While studying Han learning, they did not reject Song Learning. Liu Family showed respect for the moral doctrine of the Song School,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Lunyü zhengyi*, which was completed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Liu scholars, reflected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reconciling Song and the Han Schools.

江苏宝应县在清代汉学格局中位处边缘，但学术脉络传衍不绝，具有特色。以宝应刘氏为代表的汉学家浸润于理学传统，也体现了下层士人的学术追求，注重实证研究，并关心社会实务。他们薪火相传，逐渐在晚清汉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现有论著对此甚少注意，仅对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有所涉及。而研究者对《论语正义》的认识不一，对其宋学色彩的估价尤有分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们对《论语正义》的学术渊源缺少研究，忽略了刘氏的学术传承。本文以此为主线进行考察，为剖析清代下层汉学群体提供一个实例。

一、宝应的理学背景

康雍年间，士人治学渐趋实证，一些学者推崇程、朱而又重视考据方法，后世经学家称之为“不分汉宋”。当时士人门户观念不深，但摒弃空疏、追求实证的学风推动了士人逐渐转重汉儒经说和研究方法。宝应学者王懋竑、朱泽沄根柢于理学，与汉学还有距离；但他们注重考订，研究方法与汉学相近，反映了清初

[收稿日期] 2005-11-30
[作者简介] 罗检秋（196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由宋转汉的学术潮流。

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51岁才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时间不长，一生尽力于著述、讲学。他的叔父王式舟中康熙四十二年状元，参加修纂《朱子全书》。受此影响，王懋竑以治朱子之学名于世。康熙年间，朝廷尊崇理学，但王懋竑没有挤身于“理学名臣”。他少时“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于斯足矣”①。他以此自励，嗜好学术而淡泊名利，终于有所成就。

青年王懋竑曾以孔安国、郑玄等经师自许，又研习杜预、服虔诸家经学，熟悉考据方法。但他没有皈依于汉学，而是发展了宋学蕴含的考证传统。宋学本身包含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王懋竑的朱子研究侧重后者，不好宋儒的性理主题。他主要通过考订朱子的学术历程，以维护、完善朱子之学。他积20余年之力，四易其稿而著《朱子年谱》及《考异》各4卷。后人谓其“有志于洛闽之学，从暗修作工夫，绝不自表襮。而穷经论史……一折中于朱子，则自其少而规模盖已早定矣”②。

此前，曾有几种“朱子年谱”传世，而编纂体例和繁简不一，有的还曲解朱子。明代李默的《朱子年谱》受阳明学影响，肯定王守仁所谓朱子有“晚年定论”的说法，淡化朱、陆差异，实则以阳明学诠释朱子。王懋竑皈依朱子，力图维护朱子学的纯正性。他博采朱熹著述及前人相关年谱、传记材料，在研究的基础上，力辟李默《朱子年谱》之误，否定王守仁所谓“晚年定论”说。故王著《朱子年谱》详于学术而略于政事，凸显朱、陆异同，也为朱子学辨诬。朱子的《易本义》附有九图，本出于道家。清初学者黄宗羲、万斯同、胡渭均在著述中指出图、书出于道家，朱子不该援道入儒，混淆儒经的本来面目。对此，王懋竑博考《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书，认为：“《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也。后之人以《启蒙》依仿为之，又杂以己意，而尽失其本指者也。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其见于《文集》、《语录》，讲论者甚详，而此九图，未尝有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于《本义》、《启蒙》者多矣。”③既然九图为后人所加，当然不能归咎朱子。此说为朱子辨诬，多得学者肯定，尤其受到理学家方苞的重视。

当然，王著的个别观点仍可商榷。《朱子年谱》及其文集都认为“家礼非朱子之书”，而是后人所作。④而晚清夏炘、郭嵩焘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朱子家礼并非后人所加。这种看法也不为无据。但王著《朱子年谱》多得后世汉学家的推重。焦循认为，“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⑥。王懋竑之功，不仅在于为朱子辨诬，而且发展了朱子的“道问学”，彰显了考据研究的价值。他成为清初学术由宋转汉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期的宝应学者还有朱泽沄（1666–1732），字湘陶，别号止泉，诸生。他是王懋竑的好友，两家易子而教，且为儿女亲家。王、朱二人情好甚密，切磋学问，但见解不一。朱泽沄早年究心阳明学，偏重涵养德性功夫，而对穷理致知不甚重视。王懋竑曾致书指出这一偏向，两人学术见解不无差异。不过，朱泽沄没有停留于阳明学的德性功夫。一定程度上因王懋竑的影响，朱泽沄晚年治学有所变化。他从读《二十一史》入手，转而研究朱子，读《朱子文集》、《语类》至废寝忘食。他认识到“朱子涵养原与陆王两家不同，乃有所避忌”，朱子所讲之“理”，“皆贯通于涵养未发之中”。⑧故他所谓德性功夫也由早年的“以静为本”转而深信朱子的“居敬穷理”。他著《朱子圣学考略》10卷，收入《四库全书》，纪昀认为：“是编详叙朱子为学始末，以攻金谿、姚江之说，盖泽沄生于国初，正象山道弊、鹿洞教兴之日也。”⑨他看到了朱泽沄转向程、朱的取向，清末刘师培则注重其阳明学内涵和社会关怀，他说：“淮南之滨有朱泽沄，于是有宝应学派”，朱氏与王船山、陆世仪、张履祥，“兹数公者，虽笃守朱学，然大抵由陆、王而入程、朱”。⑩故他认为，朱氏仍带有阳明学的痕迹。“然东林学术亦守阳明之说而饰以朱子之书”，“止泉先生殆亦治东林之学派者”。⑪朱泽沄学术上与东林相似，关注社会。他研究天文、舆地、水利、河渠、社仓、学校诸法，留心于经世实务，曾撰《治河三策》，提出治理黄、淮水患的措施。

朱泽沄是宝应下层士人的一个缩影，也是传衍东林遗风的一个环节。自明末宝应学者刘永澄之后，东林学风便流播于江淮之间。刘氏字静之，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师事东林党人顾宪成，与刘宗周、高攀龙等人游，人称“淮南夫子”。刘永澄治学重“邪正之辨”，又关心国事，认为“天下”乃“人主与天下公共之器”。刘氏卒年仅37岁，其子秉承遗风，撰有《四朝大政录》，明于“君子小人之辨”。永澄父子受刘氏后人推崇，而刘氏后人又与朱泽沄家族数代联姻。刘、朱两族形成了较稳固的社会纽带，其意义不下于朱泽沄、王懋竑两家的联姻和易子而教。宝应刘、朱、王三氏学术思想上相互熏染，刘永澄父子的东林遗风感染了朱泽沄等人。另一方面，王懋竑、朱泽沄也对刘氏治学产生了影响。乾嘉以降的刘氏汉学家既重经史考据，又汲取朱子之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朱的传统。

二、汉学名家刘台拱

乾隆年间，宝应的重要学者是刘台拱（1751－1805），字端临，8岁就塾读书，十分勤奋。台拱的父亲刘世謩，号蓼野，为刘永澄的五世孙，贡生出身，曾任靖江县训导，“好读书，至老不倦。而尤深于朱子之学，沈潜玩味，反复省察微言要义，皆精诵而力行之”[12]。刘台拱的母亲朱氏，为朱泽沄从女。台拱幼年丧母，早年受家学熏陶，年10岁，“心慕理学，尝于其居设宋五子位，朝夕礼之，出入里闬，目不旁睐，时有小朱子之目”[13]。台拱年15，读先辈王懋竑、朱泽沄遗书，“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学，以圣贤之道自绳，而于文辞弗屑也”。但他主要在内圣功夫上汲取宋学，学术上仍长于考订。他21岁时中江南乡试举人，屡次会试不第。他留京期间，值开四库馆，结识当时学者名流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程瑶田、钱塘，而与同郡任大椿、王念孙“为昆弟交，相约稽经考古，旦夕讲贯，务求底于至是而后安”[14]。与这些名流相比，刘台拱年龄较小，而每发一议论，诸先生多折服。

刘台拱平生无他嗜好，以读书、授徒为业，家有藏书数万卷并好金石文字。乾隆四十九年，他得大挑二等以教职用，次年任丹徒县训导，与诸生以廉耻气节相敦勉，颇能取法程、朱。他“躬行实践，以孝名天下，当代名德至以曾、闵儗之”[15]。据传，当时扬州有“四士三美”之说，即指刘台拱的德行、汪中的文章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文字训诂之学。刘台拱爱护宗亲，“督教诸弟未尝加以辞色。诸弟严敬之，无不感其恩谊”。在他的教育下，三弟台斗成进士。从侄刘宝楠、从侄孙刘巩“少孤贫”，刘台拱皆“抚而教之，遂克成立”[16]。

刘台拱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律吕、六书、九数、声韵诸学，穷究群经，尤精于《三礼》。他有小学造诣，著有《转注假借说》，所撰偏重文字考释。刘氏校书不下千卷，治学严谨，而著作很少，且多属校书之旁的批注，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汉学拾遗》等（均收入《刘端临先生遗书》）。这些签注能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订正前代大儒郑玄、孔安国的注释。汪喜孙认为，台拱“不喜著书，以《论语》《礼经》为孔氏微言大义所在，用力最深”[17]。

综观刘台拱治学，其显著特色是不拘门户，实事求是。他偏重校勘经、子书，而治经不分今、古文，也无明显的汉、宋观念。“其考证名物，研精义理，未尝离而二之。传注有未确，虽自古经师相传之训诂，亦不为苟同，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傍门户之见。”[18]王念孙则称赞他“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与阎若璩、戴震、程瑶田等人的学识“盖相伯仲”[19]。他对汉、宋宗师郑玄、朱熹的注疏多所采纳，又有所辨正。如关于《礼记》“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一句，台拱“案，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其孙自主之矣！故以杖即位可也。而郑氏以为祖不厌孙云者，非其义也”[20]。他注意区分父亲对于嫡、庶子之丧的不同礼制，根据“父主嫡子之丧”的规定，否定郑氏泛言“祖不厌孙”之说。这实际上认同于元代陈澔的注解。

他虽立足于汉学，但汲取了宋学营养。乾嘉汉学家一般尊崇荀子，而对宋学的源头思孟学派不甚重视，而刘台拱不然。他注《荀子·非十二子》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一句指出：杨倞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台拱案：杨注非也。仁、义、礼、智、信，人道之大纲，先圣之遗教，儒者之所世守也。虽荀子亦不能舍是以为言，何得以非二子哉？”[21]他重视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学说，视之为儒学的普遍传统，认为荀子不会在这方面非议子思、孟轲，故以杨注为非。刘台拱的阐释置重儒家的“五常”，带有宋学的思想色彩。因之，宋学家翁方纲也重视刘台拱的学术研究，曾云“宝应刘生学广而气醇，吾尝谓今世后进之士考订《礼经》者，必于生属焉。……吾所属望于生者，则欲考其篇目章句而已”[22]。翁氏批评一些汉学家评议礼制、误解朱子，主张像刘台拱那样考据文字而又不悖宋学。

另一方面，刘台拱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乾隆年间的汉学风尚，嗜好校勘经、子之书，而不轻易著述。他重视研究《三礼》，很少涉及宋学论题。像许多汉学家一样，他以《礼》学取代理学，且对礼乐的本质不乏见解，认为各代礼乐虽然“事殊异文”，“然事殊而同归于敬，文异而同归于爱。盖礼乐之情，主于敬爱”[23]。他不仅认识到礼乐的情感本质，且注重其社会作用。他说，“礼者，道德之品节，仁义之等杀。循礼，则斯四者无过不及之偏”[24]。他把礼作为履践道德仁义的途径，所撰《经传小记》多为考释《三礼》的心得，受到乾嘉学者的重视。段玉裁致函友人称：“潜心《三礼》，吾不如端临。”[25]这种特色体现在刘氏的经、子考释中。他以《三礼》校注群书，如释《荀子·劝学篇》“君子生非异也”：“台拱案，‘生’，《大戴礼》作‘性’。”[26]此类注释准确明了，不乏价值。但刘台拱偏重考释文字，不像戴震、凌廷堪等人富于思想见解，没有系统的义理之学。

同时期的刘氏学者有刘履恂（1738－1795），字迪九，一字子芟，与刘台拱是共祖父的兄弟。年十八为府学附生，勤于学问，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乡试中举，多次会试不第。他长期以授徒为生，从学者众。乾隆六十年，刘履恂再度赴京会试，又不中，大挑二等为国子监典簿，旋即病逝于京。刘履恂著有《秋槎杂记》内外篇，多为考释经史的文字，收入阮元的《皇清经解》，学术上对其子宝树、宝楠有一定影响。

同县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年十八补诸生，与高邮贾稻孙田祖、李孝臣　、江都汪容甫诸先生交，皆闳洽才而钩贯经史”[27]。朱彬是朱泽沄的族孙，也是刘台拱的表弟，台拱的母亲是朱彬的姑母。朱彬说：“吾家自高祖侍御公与刘氏缔姻……吾姑母适蓼野先生，婚姻洽比，于今五世矣。”[28]刘、朱五代联姻，学术上两互切磋和影响。刘台拱、朱彬自幼一起砥砺学业，读宋、明儒书，尤其是王懋竑、朱泽沄的著作。朱彬说：“彬幼年与端临从事于此，自审未能窥其樊，端临尔时已择之精而守之固。后各从事于经学，此事遂废。”[29]两人早年均究心于宋明理学，而朱彬自认为造诣不如台拱深。朱、刘学者都经历了从宋学向汉学的转变，与众多乾嘉学者相似。但朱、刘学者始终尊崇宋学，即使转治汉学，也不訾议宋儒。朱彬认为，戴震等人的心性之论，直认宋儒无一可采，未免“立论太粗，考之未审矣！”[30]

乾隆六十年，朱彬中北榜举人，逐渐转治汉学。他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多年切劘，深通训诂、文字、声韵诸学，长于疏释经传。朱彬自少至老，勤学弗倦，治学不乏创见，著《经传考释》8卷，援引详确，辨订精当，得王念孙称许，收入《皇清经解》。他晚年还有《礼记训纂》40卷，博采群言，发明郑义，堪称专谨之作。该书虽以注疏为主，但贯穿古今诸说，并阐述自己的见解，可谓不废义理。朱彬之子士彦、士达，官位显要，朱彬晚年住养于他们的任所，而不干预公事。

刘台拱、朱彬、刘履恂都是名位不高的汉学家，朱彬虽以子贵，但晚年专于学问，在乾嘉学派中没有地位。三人以刘台拱影响最大，交游较广，且与汉学名臣阮元是儿女亲家。[32]他们以汉儒训诂、校勘之法研究儒经，体现了下层学者日益卷入汉学潮流。另一方面，他们治学也有优长，即不像一些汉学家那样明显排

斥宋学。他们虽偏重于校勘、训释，却表现出调融汉、宋的特色。这方面发扬了王懋竑、朱泽沄的传统，对于乾隆后期的学术发展具有意义，也预兆了嘉道以后的学术潮流。

三、刘宝楠和《论语正义》

嘉道时期，宝应的重要学者是刘履恂之子刘宝树、刘宝楠兄弟。二人自幼受家学濡染，精研训诂，博稽儒经。刘宝楠既发扬宝应学者调融汉、宋的传统，又体现了嘉道汉学的时代趋向，即逐渐关注社会实务，讲求经世致用，并在学术成就上有所发展。

刘宝树（1777－1839），字幼度，号鹤汀，嘉庆十二年举人，多次会试不中，晚年补五河县教谕。宝树好读书，与父、叔刘履恂、刘台拱同趣，不轻于著述，仅存《娱景堂集》3卷，上卷为“经义说略”，实事求是，语多精粹。如他训释《周易·否卦》的“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一句：“案，吉当作喜，古篆文吉、喜二字相似……此文当作‘小人喜’。《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言利贞，不言利不贞。言贞吉，不言不贞吉；言利御寇，不言利为寇也。上九‘先否后喜’，以否、喜对言，可见”[33]。这种训释颇有见地，得到刘文淇等人的肯定。刘宝树有学问，而仕途困否，曾作诗云：“千古伤心事，茫茫叩彼苍。才人能夺福，好女惯成孀。驽马升骐厩，凡禽在鹤梁。岂徒骚客问，流恨绕沅湘。”[34]古往今来，小人得志、忠良含冤的事情无数，岂只屈原而已？此诗既是作者怨叹现实处境，也是嘉道士风的写照。

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道光二十年进士，历任直隶文安、宝坻、固安、元氏、三河等地知县。他幼年丧父，在母亲督教下刻苦向学，又向兄刘宝树请益、切磋，12岁在家塾从刘台拱治学。据载，刘台拱“居乡里，不轻讲学”，惟接见刘宝楠及弟子苗某时“辄娓娓不倦”[35]，可见两代人的学术传承。嘉庆末年，刘宝楠开始在宝应城中课徒授业。几年后，从学者渐多，他于是在扬州设馆授徒，多识学者名流，与仪征刘文淇交往尤其密切。刘宝楠中进士前的20多年中，除了给阮常生当过两年幕僚外，一直专注于授徒、治学，学业大进。其次子刘恭冕记曰：道光八年，宝楠应省试时，与仪征刘文淇、江都梅植之、泾县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讨论治学，相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宝楠发策得《论语》，“自是屏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循著《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36]。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论语正义》。

刘宝楠专治《论语》似出偶然，实则有其基础。他受刘台拱等人的影响，谙熟《论语》主旨。刘履恂的《秋槎杂记》，刘台拱的《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刘宝树的《经义说略》都已融入《论语正义》中。[37]因后来刘宝楠久任知县，簿书繁琐，精力不济，仅注疏了《论语》的前14篇，后6篇由刘恭冕续补而成。《论语正义》实际上凝聚了刘氏三代人的心血。

《论语正义》汲取汉、唐及清人研究成果，尤重视汉代郑玄、马融、何休等人的《论语注》。该书又博采清代的版本、校注，既有经古文家的校注，也有今文家的见解，并涉猎宋、元、明人的注释。《清史稿》认为，该书“乃蒐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之长义，及近世诸家”[38]。这种评价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论语正义》涉及宋人的著作40多种，多为文字、音韵之书，有关儒经的著作仅有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张栻《论语解》、真德秀《四书集编》、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蔡节《论语集注》、邢昺的《论语注疏》等10多种。其中又以引朱熹、张栻的著作较多（全书共引朱熹的书50多次，引张栻的书15次）。这与全书引书总数多达400余种，引清人著作多达200余种比较起来显然很少。故研究者均注重其汉学色彩，而对其宋学因素看法不一。有的论者对后者几乎完全否定，认为书中仅引用了一点宋人校注资料，并没有摄入宋学义理。我认为，《论语正义》的主色虽是考据、训诂，引用宋人之说确实不多，但通过不同途径汲取了宋学营养：

其一，直接援引宋儒经注。如刘氏释《论语·公冶长》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云：“有道无道，不知在何时。《朱子集注》以有道属文公，无道属成公。”[39]他基本上以此为依据进行注释。又如《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对此，刘宝楠援引张栻的注解加以阐释：“人有血气，则役于血气。血气有始终盛衰之不同，则其所役，亦随而异。夫血气未定，则动而好色；血气方刚，则锐而好斗；血气既衰，则歉而志得。凡民皆然，为其所役者也。于此而知戒，则义理存。义理存，则不为其所役矣。”[40]显然，他引用宋儒解释，而且肯定以“存义理”来坚守“三戒”之类的修身信条。

刘宝楠重视援引宋儒训诂，有时也肯定宋儒训诂中的义理内涵。他认为训诂与心性不可分离：“圣人之言发明性道，汉儒训释圣言以求圣道，虽未必身体力行，其期于明道则一也。先贤朱子本训诂之学，力行圣道，本非歧而二之，至陆氏出，乃判然异矣！”[41]刘宝楠认识到汉、宋之学的不同，但主张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融合为一，从训诂中讲求性道。不过，总的来看，《论语正义》涉及和肯定性、理、天道学说的内容不多，尚未形成系统的宋学主题。

其二，引用清代宋学家的解释，间接地接受宋学思想。清前中期，宋学高踞堂庙，名人辈出，而学理上基本沿袭宋儒，少数宋学家也因应时势对宋学主题进行阐发。乾隆年间，一些汉学家明显排斥宋学家的经解、经注，甚至撰有专论进行辨驳，或在论著中将宋学摒弃于学统之外。但汉学家调和、汲取宋学的潜流始终存在，嘉道以后且成为潮流。《论语正义》即是典型体现。其中引用李光地、夏炘、吴嘉宾等宋学家的注解不少。如释《论语·子罕》说孔子“固天纵之圣，又多能也”：“纵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为限量也。’李氏光地《论语劄记》说‘圣人固是天纵，多能亦是天纵。子贡此言，可谓智足知圣。故夫子舍子贡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贵，况圣人乎？盖避圣之名而示人以学圣之方也’。”[42]这种阐释新意不多，基本沿袭宋儒旧说。

因之，刘氏“正义”有时疏离了正统汉学，而染有宋学色彩。如他赞同李光地等人以孟子性善论释孔学，而排斥荀子的性恶论。他引李光地《论语劄记》释《论语·阳货》中“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畅其说。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说也。其曰或相倍蓰而无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则习相远之说也……惟其相近，是以谓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盖孔孟所言，皆人性也。”刘宝楠认为，李光地的阐释可谓“精审，足以发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恶，是就当时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论，不为典要”[43]。他虽然尊荀，却不像一般汉学家那样接受其性恶说，而汲取了思孟学派的人性论。同时，刘氏也常援引宋学家凸显儒家纲常主题的注解。《论语·宪问》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之事，刘宝楠就此指出：“吴氏嘉宾说谓‘《春秋》绝笔于获麟，即以是年夏有陈恒执君弑君之事，当时无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书之’。其说未为无理矣！鲁三家与齐陈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请。然鲁君臣衅隙虽深，终不敢一加刃于其君，未始非夫子清议有以维持之也。”[44]他重视儒家纲常，间接地融入了宋学主旨。

其三，《论语正义》兼采今古文家的注释，援引今文家的说法时不自觉地带有宋学烙印。清代今文家研究《论语》多取训诂、校勘之途，而学理上往往汲取宋学，体现了汉、宋调和的特色，宋翔凤、刘逢禄等人尤为典型。《论语正义》援引今文家的注释时，不自觉地融入了宋学内涵。《论语·为政》有“温故知新”的主张，刘宝楠引刘逢禄《论语述何》的解释：“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45]刘宝楠一定程度认同今文家的说法，没有将“知新”局限于典制，而注重儒经“大义”。又，《论语》首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刘氏引宋翔凤《朴学斋札记》云：“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

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朋即指弟子。”“按宋说是也”[46]。这里宋学色彩似不明显，主要是沿用宋氏注释。不过，他肯定孔子因鲁之士大夫“僭离于正道”而不仕，则蕴含了德治主义取向。又如，《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一语，刘氏引宋翔凤《朴学斋札记》云：“三代之学，皆明人伦。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47]这种阐释显然带有宋学家的倾向，也是刘氏家学中的重要传统。

因而，《论语正义》虽然偏重考释文字，却也蕴含一定的义理阐述，表明著者的思想主张。如考释《论语》“学而”篇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句云：“国以民为本者，注以爱人，人指民言……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是皆言治国者当爱民也。”[48]他以传统的民本思想注释“爱人”，发扬了儒学传统，又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主张。总的来看，刘宝楠很少涉及宋学主题，但他援宋入汉也不限于文字校注，有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其义理之学。当然，就学术上讲，《论语正义》虽然精审，但有些引文过于庞杂，读起来或有不便。

刘宝楠长于名物训诂，曾指出：“国朝经学昌明，过于汉、唐。由训诂声音以求义理，复由苍颉作书之旨以求其本义及其通假，而经学益以大明。虽佶屈不可句读之书，无不晓畅明白。然则欲治圣经，先通小学。世有薄小学为不足道者，非真能治经者也。”[49]他撰有《汉石例》6卷，考释汉魏碑文体例。读了程瑶田的《通艺录》之后，他赞许其《九谷考》对禾、黍、稷考证精审，而惋惜程氏对豆、麻二谷流于阙略，乃撰《释谷》4卷，广引群书，旁推交通，对程著有所补充。[50]此外，他在前代县志的基础上，博稽汉、元、明等代正史，增补官师人物，撰《宝应图经》6卷。他还撰有《愈愚录》，考辨前代史地知识，不乏可取见解。刘宝楠在授徒、入仕的生涯中，治学不辍，其勤勉和毅力超乎常人，也较关注社会实务。

从王懋竑、朱泽沄到刘台拱、朱彬，宝应学者虽然由宋学转向汉学，并兼治汉、宋，但经世意识不明显。正如朱彬所说：“仆迂愚无似，年来有志于经，于经世济物之务未尝措怀。”[51]乾嘉时期，把学术与“经世济物之务”割裂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学者专注于考史证经，对社会实务无所用心；一些官吏则沉溺于官场事务，缺少学术造诣，刘宝楠则将学术与经世紧密结合起来。《论语正义》重视朱熹、张栻的注释，二人均属注意经世实务、避免心性空谈的学者。加之，在社会变局和经世学风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包括刘宝楠等人虽治汉学，却没有囿于校勘训诂，其言论多涉社会实务。

刘宝楠继承前辈学者尊德性的传统，并进一步践履于行动中。道光十一年淮河流域洪涝成灾、运河溃决时，他上书朝廷陈述民间疾苦，提出治理措施，认为应仿效明代湖漕之法，引漕船入白马湖，并在黄河入海口筑堤，不让河水漫溢，从而减少入海口泥沙淤积。[52]这体现了下层士人的社会关怀。道光二十年，50岁的刘宝楠考取进士，授直隶文安知县，次年赴任，从此开始了晚年的知县生涯，也获得了直接经世济民的机会。文安地势低洼，境内各庄堤年久失修，伏秋水涨，溃溢成灾。他组织丁民修堤，使该县无水涝之灾。后来，他汇集文安提工卷案，撰《文安堤工录》。在文安3年，他执法不阿，审结积案1400余起。随后署宝坻知县，他亲至现场指挥修堤抗涝，吁请赈济灾民。他“行官元氏，捐俸设厂捕蝗，得不为灾。官三河，东三省兵凯彻过境，以民价雇车应役，民以无扰”[53]。刘宝楠任县官15年，勤勉清廉，衣履朴素如诸生；又秉公执法，体恤民生。

刘宝楠的经世意识，与其交游相得益彰。他精研群籍，而善作诗。诗人梅曾亮认为，宝楠既像阎若璩一样长于经传训诂、金石舆地，而“诗宕清妙，怡人心神，或磊落质直，无所雕饰”[54]。这些诗反映了他的交游与心志。他与宋学家刘开、姚莹等交好，常有诗作赠答。刘宝楠还与刘宝树一起参加了道光十六年京师陶然亭的“江亭展禊”。这次由黄爵滋、徐宝善、陈庆镛等人组织的士人雅集，促进并

标志着士人经世意识的觉醒。

道光年间，刘宝楠与福建汉学家陈庆镛成为好友，思想、学术上互相影响。陈庆镛曾说：刘“博极群书，实事求是。曩京寓与余过从甚密，讲究六书益相得”。后来刘著《释谷考》也得陈的补正。[56]道光二十三年三月，道光帝重新起用媚外辱国的琦善、奕经、文蔚三人，陈庆镛（道光末年，他与朱琦、苏廷魁被士人誉为“谏垣三直”）即于四月上《申明刑赏疏》，认为道光帝此举“刑赏失措，无以服民”，后来道光帝“返躬自责，愧悔交深”，收回成命，将三人革职。[57]几年后，陈庆镛被迫辞职回籍，准备专事著述、讲学，刘宝楠赠诗送别。陈庆镛的好友、年轻而直爽的张穆为了纪念友谊，请人摹绘了一幅“烟雨归耕图”，陈庆镛为画作了引文。刘宝楠为张穆的“烟雨归耕图”题诗。

其诗不仅关切民生困苦，而且从传统经史发掘治水策略，带有鲜明的通经致用色彩。这是作者感慨现实，也是与张穆等人经世思想的共鸣。

刘氏兄弟关心国事，讲求经世致用，颇与乾嘉之际的学术变化相契合，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刘宝楠为乃兄所撰行状云：“先生两司学籍，不满再期，先后皆移疾归。嗟呼！吾父兄皆有过人之才，而官不足以副其所学，又且得官而不仕，仕而不能久。”[60]这是感叹刘宝树的命运，也折射出刘宝楠的境遇。刘宝楠以进士任知县，虽勤勉为政，解救民生疾苦，但因秉公执法，往往得罪地方豪绅。他在直隶虽得民心，却常在一县“仕而不能久”。无论学术地位，还是仕宦生涯，刘宝楠在当时都不显要，但学术贡献不能抹杀，也反映了下层士人的学术追求。他是刘氏汉学的高峰，也标志着刘氏的经世之学得到了显著发展。

四、刘氏汉学的余晖

刘恭冕（1824—1883）体现了刘氏汉学的延续与传承。恭冕字叔俛，幼年随父刘宝楠生活于知县任所，锐志读书，光绪五年举人。曾受安徽学政朱兰的聘请，校阅试卷，又校李贻德的《春秋贾服注辑述》，补正百数十条。同治年间，他应曾国藩之聘，与仪征刘毓崧父子等在江南官书局校书。刘恭冕幼习《毛诗》，后又研究《公羊传》，不无心得而未能成书。先后修沔阳、潜江、黄冈、应山等州县志。晚年在苏南讲学，拟撰《古文通假释》，博稽经传、《史记》《汉书》、钟鼎碑文诗及唐、宋人音义，依今韵编次，先列本字本义，次列通用之字，而不录六朝妄造俗字，书未成而卒。

嘉道以降，一些学者注重博通，治学领域也超越了儒家《五经》或《十三经》的范畴，而具体主张不尽相同。段玉裁曾提出突破《十三经》的范围，增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8书而为“二十一经”。刘恭冕赞同扩展儒经的主张，而所增书目与段氏稍异。他说，“《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国语》之与《左氏传》相辅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逸周书》《荀子》入焉”。他扩展儒经的主张是针对段玉裁、沈涛的见解而发，也与刘宝楠的思想不无关联。他说：“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读书之所。既以所闻思述前业，而旁及百氏，凡周、秦、汉人所述遗文逸礼，皆尝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61]刘恭冕广泛涉猎典籍，将自己的读书心得编为《广经室文钞》。

该集篇幅不多，有的论述不无见地，如考据文章《隰则有泮解》《古有四声证》《汉人避讳考》等，均别出新解，发前人所未发。但刘恭冕并没有囿于文字考证，而是传承儒家思想，甚至也不无宋学色彩。如他认为：“盖古之所谓才，本兼德言。故《易传》以人配天地，谓之三才。……才兼有德，未有无德而可称为才者。”“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必非无德，故夫子言才难不言德难也”。[62]这种议论看起来凸显了“才”的重要性，实际上强调了“德”作为“才”的必要条件。这既受《论语》《孟子》的影响，也是针对晚清士风有感而发。这类看法也见于他补订的《论语正义》。

刘宝楠晚年忙于知县事务，著述多由刘恭

冕补成（如《论语正义》）或整理（如《宝应图经》）。恭冕好汉学，而不訾短宋儒，对儒家微言大义的理解比较宽泛。他认为“微言，非只谓性与天道。大义者，微言之义，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著者，咸见《论语》。”[63]这是他阐释《论语》而不限于宋学主题的思想基础。

刘恭冕重视孔儒的微言大义，没有完全接受今文家的训释。他早年读何休的《论语注》，发现何注《公羊传》引《论语》的文字甚多。于是，他搜集何氏《公羊注》及其《左传膏肓》、《穀梁废疾》所引《论语》诸文，略加引伸，成《何休注训论语述》1卷。

晚清宝应学者还有成孺（原名蓉镜），字芙卿（? －1883），一字心巢，事母至孝，30岁以后绝弃科举，以诸生终。他与宝应刘氏关系密切，学术上相互影响。同光之际，他与刘毓崧、戴望、李善兰、刘恭冕等人同在金陵书局校书，得切劘之益。光绪六年主讲长沙校经堂，创博文、约礼两斋，造士众多。成孺早年邃经学，而博通历算、方舆、典礼、声音、训诂之学，其弟子冯煦称其治学三变：20岁攻词章，30岁攻考证，40岁攻义理，一生著述甚丰。

成孺治学围绕宋学主题，义理多折衷于程、朱，与弟子论学，也以主敬穷理为宗，而又操履敦笃，耻为空言。他重视治学心得，曾说“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也。”[68]他推崇程、朱，晚年论学尤以朱子为宗。但他摒弃入主出奴之见，虽重义理而兼治考据，“尝为楹帖云：求是即通儒，为义理，为训诂，为典章，门户何分汉宋？希贤无异道，曰周程，曰张邵，曰朱陆，躬修不外伦常。”[69]这与宝应刘氏兼采汉宋的特色相似，又因他深入地浸染于湖湘理学，故更具宋学色彩。

刘氏后学有刘岳云（1849－1917），字佛青，号震庵，光绪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任绍兴知府。辛亥革命后，刘岳云闭门谢客，一意著述。刘岳云为刘恭冕的族弟，学术上受其影响，又为成孺高足，秉承师传。他曾读王懋竑、朱泽沄的书，如成孺一样注重宋学的修身主题。“以立身行己为重，常引子夏‘贤贤易色’一章而释之曰：能尽伦，未学可谓之学；不能尽伦，虽学亦谓之未学。自勉勉人。”[70]与他经历相似的民国学者唐文治云：“（刘）讲求经学，一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屹然不为世风所挠。因礼之云亡，于是有《礼经通释》之作；因孝道之晦蒙，于是有《孝通》之录。”刘岳云参与了修订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治学“无门户之见”，尝言“汉学之要在典章制度，而非仅训诂字句。宋儒所讲即圣人微言大义，而非若阔论空谈”[71]。

刘岳云既讲求心性义理，又穷研训诂，并涉猎典章名物、天算、舆地之学。他生当清季，对西方格致之学有研究，曾答李善兰书云：“大抵读书之士多未明晓西法，则虽有其理，不能抉出以祛世惑。其习西法者则又先入为主，震惊佩服，不复能于中国之法求之。此所以扞（格）不入也。”[72]他主张会通中西，以西释中，著有《格物中法》及《算学十三种》等书，受当时士人重视。例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及《墨子间诂》汲取了他的《墨子格术解》和《考工轮舆围防说》。

刘岳云重视经世之学，留心经世实务。据载，他主讲成都尊经书院时，“课诸生以立身行己为纲，经世之学为用，风气为之一变”。[73]他于江防、兵事、矿政、关税、河工、疆域无不论及，著有《光绪会计表》、《矿政辑略》、《农曹案汇》等，曾参撰《湖北通志》，一生著述多达500卷。章梫说：“宝应刘氏之学自端临训导，远承其祖练江昆季东林讲肄之绪，近接予中、止泉之传，而为芙卿之先导。而佛卿先生则本其父荣禄公累世传刘氏之家学，又亲受于芙卿，广以海内名流之所阐辟，宜其为刘氏家学一大宗，王、朱、成三氏后起之巨子也。”[7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岳云在清季士林中的地位。

晚清经学趋于衰微，但宝应学者发扬调融汉、宋的传统，讲求经世致用，仍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折射出晚清汉学的生命力和趋向。

五、学术意蕴

宝应位处江淮间，并非全国学术文化中心。明清时期，全国书院星罗棋布时，宝应

“自明以来独无书院”，直到嘉庆初年，知县才设法建立“画川书院”，作为诸生读书之所。但不久即致颓败，道光初年一度重建，[75]仍与江南一些州、县的书院无法匹敌，大体缺乏人文荟萃的客观条件。在清代汉学格局中，宝应学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刘宝楠久任知县，仕途不畅，只有刘岳云官至知府，其他学者多属教谕、训导一类下层绅士。宝应名宦祠的祭祀人物包括刘永澄、朱泽沄、刘世謩、刘台拱、朱彬、刘宝楠。[76]他们只是宝应的名人，不像同府学者阮元及王念孙父子那样地位显耀。宝应刘氏具有下层或民间学者的色彩，他们是清代众多文人学士的缩影。在刘氏学术传衍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一些特性：

首先，他们受清代汉学的影响，逐渐转重考据研究，学术上调和汉、宋，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宝应本是理学深厚的区域，又逐渐融入到乾嘉汉学潮流，虽没有宗师人物，著述数量也不多，但经数代耕耘，以刘氏为代表的学者对清代学术和教育有所贡献。他们运用汉学方法，考子证经不乏真知灼见，有的成果至今仍有价值，收入《诸子集成》的《论语正义》影响尤大。这些研究是清代考据学超越前代，经学研究空前繁荣的基础。另一方面，宝应学者不居汉学中心，便于接受汉学之外的学术传统。他们接受并重视宋学，门户观念不深，虽是汉学家，却不像一些汉学家那样排斥宋学或另建一套义理之学。他们注重援引宋儒注释，直接或间接地汲取宋学义理，以不同途径兼采或调融宋学。

其次，他们汲取宋学的重心不在学术论题，而在德性修养。当代学术史家张舜徽指出：“扬州学者中，特别是宝应一县的学者，在清代二百几十年中，一直有着理学的传统。自王懋竑以至成蓉镜，都能躬行实践，为人端谨，对个人的品德要求很高，也从来不以理学二字相标榜。其中如刘台拱、朱彬、刘宝楠，都是学行兼优的人。不尚口说，但务躬行，养成了笃实不欺的学风。”[77]这种品性与其社会地位相对低微不无关系。作为下层绅士，他们虽传承儒学，却不像清初的庙堂理学，享有阐释道统的崇高地位，故他们不像理学名臣偏重宋学论题，而注重在敦勉践行上汲取和体现宋学精华。另一方面，这种取向也有其思想传统。这里通过刘永澄、朱泽沄等人传衍着东林学风，注重名节。他们学术上倾向调和，而品行修养方面则重操守。

其三，他们受理学经世传统的熏陶，也因地位低微而接近社会实际，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故他们较之江南一些汉学名家更容易走出纯考据的象牙塔。刘宝楠等人适应晚清世变风移，关注社会事务，留心经世之学，与有识之士声应气求，推动了士林学风转向经世致用。

宝应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修身理念一脉相承，至晚清更显生机，学术成就也值得注意。多年来，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集中于显宦名家，聚焦于学术主流和中心的变化，对下层或边缘学者重视不够。一些研究者虽注意到家族环境对于晚清学术传衍的意义，但现有研究仅涉及一些显宦名门（如常州庄氏、吴县潘氏等），而对下层学者的家族背景和学术传衍少有论及。下层或边缘学者往往是孕育一代学术潮流的基础，也是考察、认识上层学者的参照。宝应刘氏正是一个这样的窗口。

---

①钱大昕：《王先生懋竑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第28页。上海涵芬楼民国十八年影印《潜研堂全书》本。

②《皇清敕授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先考王公府君行状》第2页，《白田草堂存稿》卷末附录。乾隆十七年刊本。

③王懋竑：《易本义九图论》，《白田草堂存稿》卷一，第1页。

④参见王懋竑的《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白田草堂存稿》卷二。

⑥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十二，第4页。苏州文学山房刊本。

⑧参见朱泽沄的《朱子未发涵养辨一》、《朱子未发涵养辨二》，见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卷五十二，第一册，第928-929页，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⑨纪昀：《经史子集题辞》，见刘宝楠辑《宝应文征》卷四。清末汉画轩手抄本（无页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藏。

⑩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第1页。《左盦外集》卷十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7册。宁武南氏1936

年刊本。

⑪刘师培：《朱泽沄传》第4页，《左盦外集》卷十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8册。

⑫刘台拱：《先府君行述》，《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八，第37页。道光十四年刊本。

⑬阮元：《刘端临先生墓表》第1页，《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前。道光十四年刊本。

⑭⑱朱彬：《刘端临行状》，《游道堂集》卷三，第20–21页，第21页。同治七年刊本。

⑮⑰汪喜孙：《跋》，《刘端临先生遗书书后》第4页。

⑯㉕《两世乡贤录事实册》第14页，第16页，《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前。

⑲王念孙：《序》第1页，《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前。

⑳㉓㉔刘台拱：《经传小记》，《刘端临先生遗书》卷二，第23页，第25页，第14页。

㉑㉖刘台拱：《荀子补注》，《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四，第6页，第1页。

㉒翁方纲：《送刘端林归宝应序》，《复初斋文集》卷十二，第7页。光绪三年刊本。

㉗朱为弼：《赠吏部尚书郁甫朱公墓志铭》，《蕉声馆集》卷八，第20页。咸丰二年刊本。

㉘朱彬：《表弟刘保临七十寿序》，《游道堂集》卷三，第9页。

㉙㉚朱彬：《与叶子云书》，《游道堂集》卷二，第2页。

㉜刘台拱的长女嫁给阮元的长子阮常生。但阮常生并非阮元亲生，乾隆五十八年，阮元的原配江夫人卒，其父“命以族子常生成服”。(见张鉴等撰《阮元年谱》第12页。中华书局，1995年。)

㉝刘宝树：《经义说略》，《娱景堂集》卷上，第1页。道光十九年刊本。

㉞刘宝树：《鹤汀诗钞·览古》，《娱景堂集》卷下，第10页。

㉟《端临学案》，见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卷一百零六，第3册，第36页。

㊱㊸刘恭冕：《后叙》，《论语正义》第434页。《诸子集成》(1)，上海书店，1986年。

㊲刘恭冕：《论语正义·凡例》第2页，《诸子集成》(1)。

㊳《儒林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第43册，第13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㊴㊵㊷㊸㊹㊺㊻㊼㊽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06页，第359页，第178页，第367页，第318页，第30页，第2页，第11页，第10页，《诸子集成》(1)。

㊶刘宝楠：《味雪斋文钞序》，《念楼集》卷六。清末手抄本(无页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藏。

㊾刘宝楠：《问经图序》，《念楼集》卷六。

㊿刘宝楠：《释谷序》，《念楼集》卷六。

51朱彬：《干臣廉使书》，《游道堂集》卷二，第5页。

52刘宝楠：《上朱大司空书》，《念楼集》卷六。

53 64《人物志·列传下》，《宝应县志》卷十二，第340页，第341页。民国二十一年版。

54梅曾亮：《刘楚桢诗序》，刘宝楠《念楼集》卷前。

56陈庆镛：《补刘楚桢(宝楠)释谷考》，《籀经堂类稿》卷五，第21页。光绪九年刊本。

57陈庆镛：《申明刑赏疏》，《籀经堂类稿》卷一，第12–15页。

58刘宝楠：《送前给谏事陈颂南(庆镛)归里》，《念楼外集》卷一。清末手抄本(无页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藏。

59刘宝楠：《题张石洲(穆)烟雨归耕图》，《念楼外集》卷一。

60刘宝楠：《皇清修职郎安徽五河县教谕刘先生行状》，《念楼集》卷七。

61刘恭冕：《广经室记》，《广经室文钞》第28页。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

62刘恭冕：《才难说》，《广经室文钞》第7页。

64 66刘恭冕：《何休注训论语述》第3页，第8页。王先谦辑刻《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四百十二，光绪十四年刊本。

65《儒林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第43册，第13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67刘恭冕：《伍员论》，《广经室文钞》第9页。

68《心巢学案》，《清儒学案》第四册，第336页。

70 73 74章梫：《家传》，《刘岳云传志》，民国年间刊本(无页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藏。

71唐文治：《神道碑》，《刘岳云传志》。

72刘岳云：《答李壬叔先生书》，《食旧德斋杂著》卷一，第70页。光绪八年刊本。

75《书院》，《重修宝应县志》卷三，第9页。道光二十年刊本。

76见《学校制·庙制》，《宝应县志》卷六，第144页。民国二十一年版。

77张舜徽：《清儒学记》第477页。齐鲁书社，1991年。